

·文史新探·

《燕丹子》考论

杜志强

内容摘要：《燕丹子》的产生时间，学术界歧见纷呈，其与《战国策·燕策三·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、《史记·荆轲传》孰先孰后，更是讨论的焦点。本文认为，《燕丹子》与《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均产生于《荆轲传》之前。燕国灭亡后，流落到咸阳的燕地文人记录了刺秦过程，这些民间记录就是后来刺秦故事的文献来源。司马迁借夏无且的讲述来验证以往的记载，选录了《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，并补充了荆轲身世、高渐离筑击秦始皇等情节。刺秦事件在秦汉民间广泛流传，至少在司马迁之前，就已经有了乌头马角、白虹贯日等传说。相较于六朝小说，《燕丹子》呈现出更为成熟的风貌，是因为六朝小说乃有意为之，要志人、志怪，而《燕丹子》则要传（传记）人，两者写作初衷不同；《燕丹子》产生于纵横之风尚炽的时代，语言纵横铺排，亦多细节描写，而六朝世风则遗貌取神，这深刻影响到六朝小说。今天来看，《燕丹子》是一篇小说，而作者的初衷，很可能就是为人立传，只不过其中有许多民间传说而已。

关键词：《燕丹子》 《战国策》 《史记》 荆轲刺秦

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荆轲刺秦的故事已经远去了两千多年，但是，两千多年的历史风尘却依然难掩当年燕丹志报强嬴、荆轲易水悲歌及秦廷行刺等震撼人心的情节，他们的一诺千金和激情抗争赢得了无数志士仁人的击节叹赏，以至于后世有大量诗文、小说、影视剧去吟咏、描绘和演绎。可以说，在古代的行刺事件中，没有哪一件能比荆轲刺秦更影响深远、深入人心。可是，如果我们问：是谁最先记录了燕丹与田光、荆轲等人的密谋过程？是谁最先记录了荆轲在秦廷上的行刺及失败过程？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还是刘向编辑的《战国策》，还是无名氏的《燕丹子》？亦或是比他们更早的秦汉之际的文人？如果是秦人记录，那他们何由得知燕国密谋行刺的过程、尤其是密谋的细节？如果是汉人记录，那司马迁、刘向等人为何没有提及？班固为何没有著录？确实，当我们今天梳理这些千年往事时，不得不带着诸多疑惑；而面对资

料细节记载的缺失,又不得不做许多推理。因此,荆轲刺秦事件之本末,就成了学界一个歧见迭出的论题。

《燕丹子》是记载荆轲刺秦事件的小说,但学界对该书却聚讼纷纭,从成书过程到文本情节,到处都存在歧异。为此,本文从《燕丹子》的文献考察入手,来讨论这个问题。

一、学界关于《燕丹子》成书时间的看法

学界关于《燕丹子》的成书时间,元代以前没有异议,从新、旧《唐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等的著录次序来看,显然将其认定为汉前古书;元、明以后,各种歧见渐次而出,累积至今,形成了鲜明的争议。大致来说,有《燕丹子》是秦汉古书、成书于汉代、成书于六朝三种观点。

1.认为《燕丹子》为秦汉古书

持这种观点的有《周氏涉笔》的作者周端朝、明代宋濂、清代孙星衍、周中孚,以及今人鲁迅、李剑国、程毅中、李学勤等。周端朝云:“今观《燕丹子》三篇,与《史记》所载皆相合,似是《史记》事本也。然乌白头、马生角、机桥不发,《史记》则以怪诞削之;进金掷鼃、脍千里马肝、截美人手,《史记》则以过当削之;听琴姬得隐语,《史记》则以征所闻削之。司马迁不独文字雄深,至于识见高明,超出战国以后。”^①认为司马迁《史记·荆轲传》是根据《燕丹子》撰写的,并对司马迁做了哪些删节、删节的根据为何,予以分析。

这是十分典型的看法,其基本思路是以《史记·荆轲传》为时间坐标,以后支持或否定此种观点的学者大都沿着这一思路,如孙星衍云:“其书(按:指《燕丹子》)长于叙事,娴于词令,审是先秦古书,亦略与《左传》《国策》相似,学在纵横、小说两家之间……《国策》《史记》取此为文,削其乌白头、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,而增徐夫人匕首、夏无且药囊,足证此书作在史迁、刘向之前。”程毅中云:“《燕丹子》产生于汉代甚至更早,是完全可能的。……司马迁曾因其‘太过’而删削了‘天雨粟、马生角’等荒诞的情节,《史记》本身就提供了证明。所以《周氏涉笔》说它‘似是《史记》事本’,也是有道理的。”^②孙星衍、程毅中的观点与周端朝相近。

宋濂的思路略有不同,认为:“(《燕丹子》)辞气颇类《吴越春秋》、《越绝书》,决为秦、汉间人所作无疑。”宋濂从“辞气”来推断,定《燕丹子》为秦汉古书;鲁迅亦云:“《隋志》之《燕丹子》今尚存,虽不见于《汉志》,而审其文词,当是汉以前书。”^③其根据亦在“文词”。

①转引自程毅中校点《燕丹子·附录》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27页。该书附录了许多《燕丹子》的研究资料。本文引用古人关于《燕丹子》的论说,凡不再出注者,均转引自该书,其中孙星衍之语来自该书正文第1页,其他来自该书第19-34页。

②程毅中:《燕丹子·校点说明》,第4、6页。

③刘运峰编:《鲁迅全集补遗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6年,第240页。

2.认为《燕丹子》成书于汉代

这种观点主要认为,《燕丹子》是在《史记·荆轲传》的基础上增益而成,如明代胡应麟、清代四库馆臣、今人余嘉锡、马振方等均是。胡应麟云:“《燕丹子》三卷,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,然《汉艺文志》无之。《周氏涉笔》谓太史《荆轲传》本此,宋承旨亦以决秦汉人所作。余读之,其文采诚有足观,而辞气颇与东京类,盖汉末文士因太史《庆卿传》增益怪诞为此书……周氏谓乌白头、马生角,脍千里马肝,截美人手,皆太史削之,非也。”胡氏认为,《燕丹子》“辞气”与东汉相仿,所以定《燕丹子》成书于《史记》之后的东汉。有意思的是,胡应麟与宋濂均以“辞气”立论,结论却截然相反。

四库馆臣认为,《燕丹子》不见于王充《论衡》、应劭《风俗通义》,进而断定《燕丹子》成书于王充、应劭之后,其书“割裂诸书燕丹、荆轲事杂缀而成,其可信者已见《史记》,其他多鄙诞不可信,殊无足采”。四库馆臣是从文献著录的角度来讨论,余嘉锡思路同此,其结论是:“此书实出自六朝以前。”所谓“六朝以前”,当亦指东汉。马振方认为:“《燕丹子》成书时代的下限不当晚于三国时期。”^①所谓“三国”,即汉末。

多种中国小说史对《燕丹子》的时间认定不尽相同,如杨义《中国古典小说史论》倾向于《燕丹子》成书于西汉^②,侯忠义《汉魏六朝小说史》认为《燕丹子》在“东汉末年成书定稿”^③,王枝忠《汉魏六朝小说史》将《燕丹子》置于汉代小说中论述,而对其成书时间则列举不同说法,没有下结论^④。值得注意的是,以上小说史作者没有沿袭《燕丹子》与《史记·荆轲传》孰先孰后、增益而成的思路,而是突出了荆轲刺秦的民间传说性质,体现出现代学术眼光。

3.认为《燕丹子》成书于六朝

持这种观点的有清代李慈铭、今人罗根泽、曹亦冰、张海明等。李慈铭云:“(《燕丹子》)文甚古雅,孙氏谓‘审是先秦古书’,诚未必然,要出于宋、齐以前高手所为。”宋濂、胡应麟、李慈铭等人均以“辞气”、“文词”等立论,结论却一是秦汉古书,一是东汉,一是宋齐以前高手所为,相去何其之远!

曹亦冰《侠义公案小说史》将《燕丹子》置于魏晋南北朝时期,认为《燕丹子》是“中国侠义小说的第一个胚胎”^⑤,惜其未列断代的证据。罗根泽对孙星衍的观点进行了逐条批驳,认为《燕丹子》产生的时代“上不过宋,下不过梁,盖在萧齐之世”^⑥,张海明认为《燕丹子》是江淹所作,并对江淹托古的时间、动

①马振方:《〈燕丹子〉考辨》,《浙江大学学报》2010年1期,第109页。

②杨义:《中国古典小说史论》,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89页。

③侯忠义:《汉魏六朝小说史》,春风文艺出版社,1989年,第11页。

④王枝忠:《汉魏六朝小说史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34页。

⑤曹亦冰:《侠义公案小说史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11页。

⑥罗根泽:《〈燕丹子〉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》,《古史辨》第六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,第365页。

机等进行了推理^①。其中罗根泽在分析《燕丹子》的文献著录问题时,寻找到了新的线索并据以分析,这是罗氏研究的一大亮点,具体详后。

以上是学界关于《燕丹子》成书时间的三种看法。在纷纭的观点中,有三条思路值得注意:一是讨论《燕丹子》与《史记·荆轲传》孰先孰后,二是考察《燕丹子》的文献著录,三是直接从民间传说来分析。

二、《燕丹子》的著录问题

《燕丹子》不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一般来说,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不著录,很可能意味着《燕丹子》在刘向、班固的时代尚未成书,但疑问有二:

其一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据以成书的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中有没有《燕丹子》的信息呢?有人在《史记·荆轲传》司马贞《索引》、裴骃《集解》中找到了线索。《索引》:“刘向云:‘丹,燕王喜之太子。’”《集解》:“刘向《别录》曰:‘督亢,膏腴之地也。’”孙星衍据此认为:“刘向《七略》有此书,不可以《艺文志》不载而疑其后出。”孙氏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人的认同,如李剑国云:“(刘向)作有《燕丹子叙录》,编入《别录》,班固删改《七略》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时,偶尔遗之。”^②李学勤亦赞同孙氏观点:“《燕丹子》的不见,不知是班固所删,还是后世的脱误,但从《别录》推断,《燕丹子》很可能是存在的。”^③但问题在于,刘向这两句话仅关系到荆轲刺秦王故事中的两个小小细节,没有资料证明这两句话就一定是针对《燕丹子》这本书的,也有可能是针对其他相关书的。

其二,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法家类”著录有“《燕十事》十篇,不知作者”,杂家类著录有“《荆轲论》五篇,轲为燕刺秦王,不成而死,司马相如等论之”。这两书(文)有没有可能是《燕丹子》的别名呢?答案是:基本没有可能。因为《燕十事》著录于法家类,与《燕丹子》的小说(或传记?)性质完全不符;《荆轲论》是司马相如等论荆轲的文章,也肯定不是《燕丹子》的别名。所以孙星衍明确指出:“(二书)俱非《燕丹子》也。”那二书与《燕丹子》有何关系呢?胡应麟云:“《汉志》有《荆轲论》五篇,《燕丹》必据此增损成书者。”胡氏认为,《燕丹子》成书于东汉,是根据《荆轲论》增损成书;进而认为,如果《燕丹子》果真系太史本事,那《汉书·艺文志》没有遗漏的理由。

现在来看,孙星衍的观点有一定道理,胡应麟的看法显得武断;但按照孙氏的逻辑,却难以回答为何《汉书·艺文志》没有著录《燕丹子》的问题。

以上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著录问题。之后,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小说”类著

①张海明:《〈燕丹子〉与〈史记·荆轲传〉之关系》,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2012年6期,第21-37页。

②李剑国:《〈燕丹子〉考论》,《古稗斗筭录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,2004年,221页。

③李学勤:《论帛书白虹及〈燕丹子〉》,《河北学刊》1989年5期,第55页。

录“《燕丹子》一卷。丹，燕王喜太子”。这是《燕丹子》见于正史目录的最早记载，由此可以确定《燕丹子》成书于唐前。此后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“小说”类著录“《燕丹子》三卷，燕太子撰”，卷数从《隋志》的一卷变成三卷，且明确注明作者为燕丹。今天来看，《燕丹子》作于燕丹之手，基本可以排除；之所以变成三卷，只不过是將原文分成上、中、下三篇而已，内容应该不会有变化。

除此之外，唐代马总《意林》卷二著录有“《燕丹子》三卷”，且节选、简编了其中部分内容。按常理，《意林》著录的文献价值应该不出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，但是考虑到《意林》的资料来源，则仍有讨论的价值。罗根泽论曰：“梁庾仲容《子钞》载有《燕丹子》三卷。《子钞》虽亡，然高似孙《子略》谓马总《意林》一遵庾目。考《意林》所采与今本同，则梁时已有矣。”^①罗氏根据高似孙的观点认为，《意林》著录的书目全本于梁庾仲容《子钞》，《意林》著录《燕丹子》三卷，则《子钞》也应著录《燕丹子》三卷，进而证明《燕丹子》成书于梁前。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，根据罗氏的考证，大致可以将《燕丹子》成书时间的下限确定在梁前；李学勤认为罗氏的考证“虽系推论，大致可信”^②。

以上是唐前文献关于《燕丹子》的著录情况。除《隋志》有明确记载外，其他都没有，遂致疑窦丛生，学者也只能就此推论，于是歧见迭出。我们大致同意孙星衍等人的观点，即《燕丹子》为汉前古书，至少在《史记》之前。后文将进一步分析、论证。

三、荆轲刺秦事件在汉魏时期的流传情况

荆轲刺秦事件曾在汉代广泛流传，兹罗列、分析、论证材料如下。先分析那些注明文献出处的材料，然后分析没有注明出处的叙述。

《秦零陵令上书》：“荆轲挟匕首卒（猝）刺陛下，陛下以神武扶揄长剑以自救。”（《文选·吴都赋》刘渊林注引）

这是秦始皇时期零陵县令上书的文字。该文著录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班固注云：“难秦相李斯。”可知零陵县令上书秦始皇，并借以驳丞相李斯。其中秦始皇“扶揄长剑以自救”的细节，与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中荆轲逐秦王、秦王负剑、拔剑击荆轲的记载相合，而与《燕丹子》中秦王因听琴音而拔剑的记载有出入，也说明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的相关记载较符合事实，而《燕丹子》则较为夸饰，不完全符合史实。

贾谊《新书·淮难篇》：“燕太子丹篇，然故荆轲杀秦王政。”

这是贾谊对荆轲刺秦的引述。其中“杀”，应当解释为行刺；其来源则是“燕太子丹篇”，从字面推理，“燕太子丹篇”很可能就是《燕丹子》。

王充《论衡·虚语篇》：“传书又言：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王不得，诛

①罗根泽：《〈燕丹子〉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》，《古史辨》第六册，第365页。

②李学勤：《论帛书白虹及〈燕丹子〉》，《河北学刊》1989年5期，第55页。

死。”

《论衡·感虚篇》：“传书言：燕太子丹朝于秦，不得去。”

《论衡·增语篇》：“传语曰：叮叮若荆柯之间。言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，后诛荆轲九族，其后悲恨不已，复夷柯之一里，一里皆灭，故曰叮叮。”

《论衡·是应篇》：“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，天雨粟，乌白头，马生角，厨门象生肉足。”

应劭《风俗通义》：“燕太子丹仰天叹，天为雨粟，乌白头，马生角，厨中木象生肉足，井上株木跳度渎。俗说：燕太子丹为质于秦，始皇执欲杀之，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。丹有神灵，天为感应，于是遣使归国……原其所以有兹语者，丹实好士，无所爱吝也。故闾阎小论饰成之耳。”

这是王充、应劭关于荆轲刺秦事件的引述，其中“传书”“传语”“世言”“俗说”诸词耐人寻味，它们可以证明，王充、应劭引用的应是荆轲刺秦的其他文本；这些文本不是《燕丹子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·荆轲传》，因为诸如“叮叮若荆柯之间”“厨门象生肉足”“井上株木跳度渎”等细节，均不见于三书。从内容来说，这些细节具有较鲜明的民间传说性质，所以程毅中认为：“应劭所谓‘闾阎小论’，明是汉之民间小说矣。”^①如果联系起“乌白头”“马生角”等来看，则汉代关于荆轲刺秦的“民间小说”有着较为丰富的内容。这不仅是刺秦事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见证，也是《燕丹子》产生的历史土壤。

进而我们会问：这些细节有没有可能是《燕丹子》佚文？从今存《燕丹子》来看，其叙述文本首尾自具，应当较为完整，尤其是这些特色鲜明的细节，亡佚的可能性较小。从王充的生活年代推理，这些文本应当产生于西汉，至少在东汉前期以前。我们再问：王充、应劭引用的文本，与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燕丹子》等文献孰先孰后？这很难回答，但从司马迁《史记·荆轲传》论语中“世言荆轲，其称太子丹之命，‘天雨粟，马生角’也，太过”的话来看，司马迁知道当时有很多关于刺秦事件的缘饰、传说，即在“乌头马角”之外，还有诸如“叮叮若荆柯之间”、“厨门象生肉足”、“井上株木跳度渎”等传说，司马迁不过举其代表而已。若真如此，则王充、应劭所据的“传书”“传语”“俗说”等可能来源甚古，大概产生在司马迁之前。无论如何，这些资料说明，汉代社会上存在着荆轲刺秦的不同文本、传说甚至民间小说，程毅中的话“这个故事曾广泛流传于秦汉之间则是无可怀疑的”^②，应当是这一现实的准确概括。

以上是表明文献来源的材料，还有一些材料仅仅叙述刺秦事件的部分细节，而没有标明文献来源，如：

邹阳《狱中上书自明》：“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，白虹贯日，太子畏之。”“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，以信荆轲之说，而匕首窃发。”（《史记》卷八三

^①程毅中：《燕丹子·附录》注语，第20页。

^②程毅中：《燕丹子·前言》，第6页。

《邹阳传》)

刘安《淮南子·泰族》：“荆轲西刺秦王，高渐离、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，闻者莫不瞋目裂眦，发植穿冠。”

刘向《列士传》：“荆轲发后，太子相气，见白虹贯日而不彻，曰‘吾事不成矣！’后闻轲死，太子曰：‘吾知其然也。’”（《文选》卷三九邹阳《狱中上书自明》李善注）

孔衍《春秋后语》：“荆轲至秦，乃进地图，王乃以御掌接之。舞阳捧于期首盛，战惧不敢进。轲乃复取进之，秦王又以御掌接之。荆轲乃擒秦王袖，秦王大惊。轲谓曰：‘欲作秦地之鬼，欲作燕地之囚？’秦王惧死，答之：‘愿为燕国囚。’轲乃不煞。秦王谓轲曰：‘请与后宫别。’轲许，遂置酒与轲饮。秦宫女乃鼓琴送酒，琴曲中歌云轲醉，教王掣御袖越屏走。轲不会琴音，而秦王会之，遂御袖而走。轲以匕首击之，不中，中银柱，火出。轲大笑，秦王左右遂煞荆轲。”（唐·胡曾《咏史诗》注引，节选，《四部丛刊》）

萧绎《金楼子·杂记篇》：“田光、鞠武俱往候荆轲。燕太子以舞阳性好弹，太子为作金丸。燕田光、鞠武往候荆轲，轲时饮酒醉卧。光等唾其耳中而去。轲醉觉，问曰：‘谁唾我耳？’妇曰：‘燕太子师傅向来，是二人唾之。’轲曰：‘出口入耳，此必大事。’”

这五条材料中，汉代三条，东晋一条，萧梁一条。就其内容而言，邹阳、刘向的记载关系到“白虹贯日”、“宋意击筑送别”两事。以情节而论，“白虹贯日”、“宋意击筑”均是不见于《燕丹子》（《燕丹子》中是“宋意和声”）、《史记·荆轲传》、《战国策·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的重要细节，说明邹阳、刘向的记载别有来源。孔衍《春秋后语》的记载与《燕丹子》《史记·荆轲传》尤多不同，最明显的是荆轲刺秦王时与秦始皇的对话“欲作秦地之鬼，欲作燕地之囚”细节。萧绎《金楼子》中关于田光、鞠武唾荆轲耳朵之事，也是极罕见的细节。这些细节，要么是后人的附会，要么是来源于其他文本或民间传说，也说明荆轲刺秦的故事汉代以后的流传情况。

另外，唐代李远有七绝《读田光传》：“秦灭燕丹怨正深，古来豪客尽沾襟。荆卿不了真闲事，辜负田光一片心。”不论其诗之内容如何，仅就题目来看，李远生活的时代确实是流传着一篇作品——《田光传》；《田光传》已佚，其作于什么时代，已难考定，我们推测，其产生应该较早，因为在《燕丹子》、《史记·荆轲传》等作品中，关于田光的详细资料极少；因为少，所以才需补作传记。大概在秦汉时期，关于田光的资料、传言尚多，写出田光传的可能性较大；如果在六朝时期，资料散失，杜撰《田光传》是有难度的；若全凭虚构，则价值不大，且难服读者。因此，《田光传》也应是秦汉时期涉及刺秦事件的一个文本。余嘉锡推测《田光传》是《燕丹子》的别名，其实在《燕丹子》中田光显非主角，因此，将《燕丹子》称《田光传》，似乎名不副实，所以我们不认同。

以上介绍的是与《燕丹子》、《史记·荆轲传》等有较明显细节区别的文

献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与《燕丹子》相合的文献,如张华《博物志》、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引文,其情节、文字与《燕丹子》相合,这可以证明,张华生活的西晋时期《燕丹子》已经存在,当然也可看作是荆轲刺秦事件在汉代以后广泛流传的见证。六朝诗人如王粲、阮瑀、左思、陶渊明、阳缙等人均有吟咏荆轲的诗篇,尤其是陶渊明《咏荆轲》一诗,以跌宕的文辞、浩然的气势铺写了对刺秦事件的赞赏、遗憾、慨叹、哀婉之情,说明刺秦事件的影响走向更深层。

四、较早记录刺秦事件本末的人

《燕丹子》成于谁手?这个问题,今天已经难以具体到某人了,但其间可以讨论的余地还是有的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记载为燕丹撰,这几不可能,因为在刺秦事件之后,秦、燕两国关系紧张,随即爆发战事,一年内燕丹被杀;揆诸常理,这种情形下燕丹很难了解到荆轲刺秦的具体细节,国事危逼,他也应当无心撰写此类小说。所以,燕丹本人撰写《燕丹子》或记录荆轲刺秦本末的可能性极小。哪些人最有可能记录此事呢?

首先,关于燕丹、田光、荆轲谋划刺秦的过程。在刺秦之前,这是绝密,不可能有多人知道;刺秦之后,事件给燕国带来了灾难,成为燕国舆论的焦点,这时,燕丹等人密谋刺秦的过程才会浮现出来,燕国谋士或好事者将之记录下来,有条件,也有可能。

其次,关于殿上行刺细节的记录。最先记录刺秦细节的应当是秦国史臣,但秦廷档案在项羽火烧咸阳之后化为灰烬,所以,这部分记录应当没有保存下来。可是,刺秦事件如此震撼人心,所以,咸阳士大夫必然多有议论,好事者记录下来以传奇,当在情理之中。问题是,秦人如何得知燕丹、荆轲的密谋过程?是秦人审问秦舞阳时秦舞阳的供述吗?即使秦舞阳有供述,那也是朝廷密档,难以广泛流传,一般好事者难以得知。

我们以为,流落到咸阳的燕人记录的可能性较大。刺秦六年之后,秦灭燕,燕人必有人咸阳者,他们在燕了解到燕丹、荆轲谋划刺秦的过程,来到秦京,听到荆轲刺秦的较多细节,这对他们的震撼不言而喻,于是,将两部分细节合而为一、记录下来。从现有相关记载来看,其情感倾向均是同情燕丹、荆轲的遭遇,这应当与其原记录者是燕人的身份有关。我们还推断,这些记录都来源于传言,而不是史家实录,因为史家实录很难流传于市井;正因为来源于传言,所以其间会有许多离奇的情节,诸如乌白头、马生角之类;这些离奇的情节也都是有利于燕丹、荆轲的。这些记录,应当就是后来《燕丹子》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乃至汉代各种关于刺秦事件的民间小说的文献来源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周中孚的论述“(《燕丹子》)当由六国游士哀太子之志,综其事迹,加之缘饰,故有仰天叹息、乌白头、马生角及秦王乞听琴声而死之语”有一定道理。所谓“六国”当以燕国的可能性最大,“游士”应当指流落秦京的燕人,其中燕地文人尤其是纵横家的可能性较大。

五、《燕丹子》与《史记·荆轲传》、《战国策·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的关系

记录荆轲刺秦故事的文献主要是《战国策·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《史记·荆轲传》和《燕丹子》，三者孰先孰后，歧见纷呈，尤其是《燕丹子》与《史记·荆轲传》的关系，成了学人确定《燕丹子》成书时间的坐标。我们的疑问是：三者之中有无母本、谁是母本？

先分析《史记·荆轲传》与《战国策·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的关系。这两篇文字，除《荆轲传》之开头、结尾不见于策文之外，其他绝大雷同（仅个别虚词相异），所以，肯定存在着一个母本。至于这个母本是《史记》还是《国策》，还是两者之外的另一个文本，意见不一，其根源就是司马迁《刺客列传》末尾的论语：

太史公曰：世言荆轲，其称太子丹之命，‘天雨粟，马生角’也，太过。

又言荆轲伤秦王，皆非也。始公孙季功、董生与夏无且游，具知其事，为余道之如是。

这段文字可注意的问题有：司马迁在创作《荆轲传》之前，有没有看到荆轲刺秦的文本？如果有，是什么样的文本？秦始皇御医夏无且对司马迁作《荆轲传》有多大影响？对此，学人言人人殊，如方苞云：“彼（司马迁）自称得之公孙季功、董生所口道，则非战国旧闻，明矣。”^①方苞的意思是，《荆轲传》是完全根据公孙季功、董生的口述而完成，没有依靠战国旧闻，顺此逻辑推理，则司马迁也没有依靠固有文献了。今人马振方的表述更为明确：“司马迁并未见到文字材料。”^②如此则《国策·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文字之雷同于《史记》，只能是《国策》节录《史记》文字了。方苞的话很明确：“《国策》本无是文，或以《史记》之文入焉。”^③从这种观点推理，则夏无且就成了后世荆轲刺秦故事的直接源头。

另一种观点认为，是《史记》移录并补充了《国策》文字。如郑良树认为，《史记·荆轲传》是“太史公据《战国策》加以补充，绝非后人据《史记》补《战国策》”^④，赵生群亦认为，司马迁论语只是“确认了有关文献记事的可靠性”，《荆轲传》仍是司马迁自《战国策》“采入《史记》”^⑤。

还有一种观点更为复杂，如杨宽的表述：“《燕策三》第五章所载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之事，当采自纵横家之原有之记载，《刺客列传》则采自《策》文

①方苞：《书〈刺客传〉后》，《方望溪全集》卷二，《四部丛刊》本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2年，第42页。

②马振方：《〈燕丹子〉考辨》，第108页。

③方苞：《书〈刺客传〉后》，《方望溪全集》卷二，《四部丛刊》本，第42页。

④郑良树：《〈战国策〉研究》（增订版），台湾学生书局，1982年，第101页。

⑤赵生群：《论〈史记〉与〈战国策〉的关系》，《南京师大学报》1990年1期，第43页。

而略有增饰,如鞠武答太子丹之言。惟有末段所叙殿上行刺经过,则依据公孙季功等所述夏无且所说。今本《战国策》所以与《刺客列传》全相同者,盖后人又据《史记》以增补《战国策》。”^①杨宽认为,先有战国纵横家记载荆轲刺秦本末,《战国策》据以节录成文,后来司马迁据《战国策》以及公孙季功等人的转述以成《荆轲传》,后人又将司马迁描述殿上行刺的文字移入《战国策》。

对以上看法,我们认同第二种,即《荆轲传》系据《国策》以成文。就第一种观点而言,说司马迁仅仅依据公孙季功、董生转述夏无且之语而成《荆轲传》,这不合司马迁论语的逻辑。首先,将司马迁“世言荆轲,其称太子丹之命,‘天雨粟,马生角’也,太过”之“世言”,解释成“世间传闻”^②或“民间传说”^③,进而推断司马迁没见到文字记载,这不合适,因为司马迁只是说“天雨粟”、“马生角”等情节“太过”,并没有说这些情节不见于文字记载。其次,关于夏无且“为余道之如是”,司马迁只是说夏无且讲述的内容就是这样,而且他用这些内容纠正了原来的情节,诸如删去了荆轲刺伤秦王的细节,即用夏无且讲述的内容去印证、纠正原来的情节,而并没说这些情节不见于文字记载。也许有人会问: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,如果他看到了文字记载,那为什么还措辞曰“世言”,而不说“传(传记)言”?我们以为,正因为司马迁是史学家,所以他才对“天雨粟”“马生角”等小说家言称为“世言”,而不是“传言”,这正反映出司马迁的严谨;所以,将“世言”解释为“世间传闻”或“民间传说”,有点偏窄甚至想当然。第三,认为《荆轲传》系在《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的基础上增益而成,与《荆轲传》末尾的论语并不矛盾。司马迁在鉴别材料,他看到了小说家言中荒诞、不实的情节,听到了夏无且等人讲述的内容,进而印证了《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的可靠性,所以他才采录、补益了策文,传末的论语只不过就像是题外话一样交代了他写《荆轲传》中的一个细节、一个花絮而已,而我们如果用这个题外话来确定司马迁没有见到文字材料,理由并不充足。所以,我们认为,将司马迁之“世言”解释成“小说家言”,可能更合情理;而所谓小说家言,应当就是《燕丹子》之类的小说。

再分析第三种观点。我们认为,杨宽的观点疑古过甚。首先,如果战国纵横家能留下关于荆轲刺秦的记载,那他们为何无法记录殿上行刺的情节?殿上行刺是那么传奇,正符合人们津津乐道的需要,要封锁其私下传播基本不可能,记录者至少有可能通过私下传播得知殿上行刺的细节,所以,他们完全有可能记录这一情节。其次,按杨宽的观点,是司马迁依据夏无且的讲述记录了殿上行刺情节,后人再将这一情节添加于策文之中,这样的逻辑,于文献无据,也不符合古代文献传布的基本情况。如果后人好事,对古书文字这样缝缝补补,那

①杨宽:《战国史料编年辑证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1年,第1137页。

②马振方:《〈燕丹子〉考辨》,第108页。

③杨义:《中国古典小说史论》,第89页。

我们所说的信史就很值得怀疑了,比如后人可以借《左传》中的《易》卜修改、增益《周易》中的细节,可以借《孔子家语》中的材料增益《论语》中的内容,很难想象这样增益的后果。退一步说,如果今传《战国策》是曾巩校订、刊布,其间有曾巩的增饰,那这个增饰后的《战国策》肯定会引起当时学者的质疑,这些质疑也应该会在时代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,可是没有,这正说明曾巩校订的《战国策》得到了时人的认可,进而反证出曾巩审慎的校订态度。

总之,我们认为,司马迁《荆轲传》系据《国策》以成文,司马迁增补了开头、结尾的两段内容而已。

再来分析《燕丹子》与《史记·荆轲传》、《战国策·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的关系。总的看法是,《燕丹子》是《史记》之前的书,其来源与《史记》、《国策》不同,但《史记》、《国策》为我们了解、确定《燕丹子》之产生时代提供了鲜明的背景和间接证据。

第一,司马迁《刺客列传》论语中提到的天雨粟、马生角以及荆轲刺伤秦王的情节,虽不见于《荆轲传》和《国策》,司马迁也没有说该情节来自《燕丹子》,但不可否认的是,该情节恰好出现在《燕丹子》中,说明该情节很可能来自《燕丹子》,至少是类似的文本或传闻。还有,《国策》、《荆轲传》中有购徐夫人匕首、夏无且以药囊击荆轲的情节,而《燕丹子》中没有,《燕丹子》中有机桥不发、进金掷龟、脍千里马肝、截美人手、秦王听琴姬得隐语的情节,而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则无,说明《燕丹子》的创作没有受到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文献的影响,其素材来源当与之有别。假如《燕丹子》产生于《史记》之后,那创作者为何舍弃夏无且药囊击荆轲这一情节呢?情理难通。如前所述,将《荆轲传》司马迁论语中的“世言”解释为小说家言,认为司马迁了解这些小说家言,只是以其荒诞离奇而不予采录,所以,将《燕丹子》产生的时代确定在司马迁之前,从这些细节来分析,要比确定其在后更合情理,更能讲得通。

第二,《战国策·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出于秦末纵横家之手(出于燕国纵横家之手的可能较大),为我们了解《燕丹子》的产生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背景。前文已述,秦国档案已焚毁,秦廷史臣对事件的记载已不存,今传关于刺秦的记载都来源于传闻。在这之后、司马迁之前,除《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的记载之外,还流传着“天雨粟、马生角”之类的其他传闻,进而可推断,秦末的文人根据各自的见闻创作,有些记载较为理性、近于史实,以《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为代表,有些记载较为感性、近于小说,以《燕丹子》为代表。而且,这些记载并没有囊括当时所有的相关传闻,因为至少邹阳文中提到的“白虹贯日”之情节就不见于《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与《燕丹子》,司马迁采录了最接近史实的《燕太子丹质于秦章》,提到“天雨粟、马生角”,而对“白虹贯日”则只字未提;揆诸情理,司马迁应当了解“白虹贯日”这一情节,可为何不提?其实司马迁只是以“天雨粟、马生角”来代指此类离奇情节,如《燕丹子》中的机桥不发、进金掷

龟、脍千里马肝、截美人手、听琴姬得隐语，《燕丹子》之外的“白虹贯日”等情节，司马迁没有罗列而已。

六、《燕丹子》与中国小说

学界基本一致认为《燕丹子》是一篇小说，可是从小说的发展史来看，中国小说直到六朝时期才形成短篇的志人、志怪体制，而《燕丹子》成书于秦汉之际，却首尾完整，情节离奇，描述生动，篇幅较长，体现出较为成熟的风貌，这似乎不合中国小说的发展规律，该如何理解？

我们的看法是，《燕丹子》为《史记》之前的古书，其小说风貌似乎较六朝小说更为成熟，有其原因在。首先，从描写内容来看，六朝志人、志怪小说之简练、短小，是因其选择的描写对象都是片段性的、情节较为简单的人事，不需要太长的篇幅就能说明问题；如果他们也选择了较复杂的人事，那篇幅就不会太短，《搜神记》中干将、莫邪的故事，就不算短；反过来看，《燕丹子》描写的荆轲刺秦就明显是更为复杂的历史事件，这必然需要较长篇幅。

其次，从六朝世风来看，六朝文艺偏重于描绘神采，有遗貌取神的倾向，《世说新语》之志人就是典型，可以说，六朝小说体现出的简练、短小的风貌，一定程度上也是时代审美倾向决定的；而《燕丹子》出于秦汉之际或汉初，那正是纵横家文风盛行的时代，而纵横家文风之描写与铺排在文学史上又十分典型，《战国策·苏秦始将连横》中的细节描写不仅繁富，情节也富于戏剧性，有似小说，正因此，《燕丹子》就呈现出比六朝小说更为繁富的细节描写和更为复杂的情节。

再次，产生《燕丹子》的时代，正是纵横之风盛行的时代，社会发展中的个人作用比较明显，也被相应地夸大；在夸大的基础上被写成传记，也应当是世风发展的合理逻辑；作为纪传体的巨著，《史记》可看作是这方面的总结。如果某一个体的作用本来就已经很突出，而且还附着浓厚的传奇色彩，那更会成为传记的重要选题，燕丹、荆轲正符合这一特点。今天我们一致将《燕丹子》定为小说，但也许在创作者眼里它是传记，只不过这个传记融入了许多奇闻而已。所以，《燕丹子》的创作初衷可能与司马迁写传记差不多，差别主要在素养、态度、识见、文笔等方面。从这个角度来理解，则六朝小说是有意为小说，要志怪、志人，而《燕丹子》是要传人，其写作初衷不同，所以就显得更为繁富、复杂。我们以为，如果以今天的文体标准来看，《燕丹子》应属小说，但如果联系起当时的写作实际来看，则《燕丹子》很可能是一篇人物传记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杜志强，男，文学博士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汉魏六朝文学文献。